

研究近代中國城市發展的一個案例

——評介包德威著「中國城市變遷」*

張 玉 法

書名：*Urban Change in China: Politics and Development in Tsinan, Shantung, 1890-1949*

著者：David D. Buck (包德威)

出版：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8

頁數：xvi+296

研究近代中國城市發展的著作，較早為學術界所重視的是路茲·墨爾腓 (Rhoads Murphey) 的「上海：近代中國之鑰」(*Shanghai: Key to Modern China*)，一九五三年由哈佛大學出版部出版。該書前半部論述上海的環境與開港經過，後半部論述上海與內陸的商業、商埠的貿易、上海的食物供應、上海的製造業、以及上海的展望。墨爾腓對於史料的處理，大體是依性質分類的，不是依時間分期的。二十五年後，包德威出版他對濟南市發展的研究成果，題名「中國城市變遷」，該書對史料的處理，大體依時間先後分期，每期再依史事的性質，分別論述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

包德威，一九七一年史丹佛大學博士，「中國城市變遷」一書係就其博士論文改寫而成。近年研究義和團運動及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國大陸的城市化問題，並任教密奧瓦基 (Milwaukee) 威斯康辛大學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歷史系，主講東亞近代史。一九七七年任系主任，迄今。

「中國城市變遷」一書的架構，主要在第一章中論述。第一章題名「濟南與近代中國歷史中的城市問題」，廣泛討論研究中國城市的有關問題。研究近代中國城市的人每認為近代中國城市可以扮演一種角色，為新經濟、新社會、新政治制度的

* 本文初稿，曾於民國七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在本所討論會中提出報告，討論熱烈。文中部分評論意見，係由本所同仁提出，特此註明，並致謝意。

中心，由此向四週放射，而使全國改變。著者認為：這是由西方城市發展的歷史想像而來，中國並不如此。著者首先論述十九、二十世紀西方城市發展的歷史，並說明中國口岸城市與西方城市的異同。中國口岸城市多屬殖民地城市，常幫助帝國主義者榨取中國的資源，對內陸的現代化沒有多少好處。由於城市與鄉村產生差距，造成社會危機。後來中共在鄉村起家，以鄉村包圍城市，獲得政權，並以鄉幹治理城市。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中國城市是傾向於消費者中心的（consumer-oriented），從內陸及鄉間吸取物資，供城市的需要；一九四九年以後的中國城市是傾向於生產者中心的（producer-oriented），以城市為中心發展工業，供社會所需。由於一九四九年以後的中國城市發展不走西方城市發展的路，本書研究濟南的發展，止於一九四九年。研究的範圍，限於濟南追從西方城市發展模式時期。

著者表明，撰寫本書的目的有二：一為探討一個中國城市在二十世紀前半期如何發展變遷，二為以此一城市的發展經驗，幫助估量城市在近代中國歷史上的角色。選擇濟南作為研究對象的原因有三：①濟南是一個內陸城市，沒有港口城市的特色，港口城市常有外人管理，城市發展受外人影響大；濟南則純由中國人管理，受外人影響較小。②濟南已有工商業基礎，有潛力循照西方工業城市的模式發展，得以比較其發展與西方城市有何不同。③濟南為省會，有相當良好的行政管理，因而可以觀察中國人本身如何用現代的方法發展濟南。

全書共分九章，將濟南發展的歷史分六個時期論述，即十九世紀晚期、清末改革時期（一九〇一～一九一一）、民初時期（一九一二～一九一六）、軍閥時期（一九一六～一九二七）、國民政府統治時期（一九二七～一九三七）、戰爭時期（一九三八～一九四八）。每一時期均探討政治、經濟的發展，和社會、文化生活的改變。著者認為影響濟南現代化的因素有三：①外國的影響，②中國的政治領導（包括軍事化的擴張），③經濟變遷的一般模式。在研究濟南發展的六個時期中，著者均就這三個因素加以考慮。

從本書的副標題，可以看出著者研究的重點是濟南的「政治」和「發展」兩方面。在政治方面，特重與濟南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權力有關的人物，以觀察權力如何運用，以及一八九〇至一九四九年間的權力運用與十九世紀中期有什麼不同，並探討傳統時代的紳權如何轉移到現代社會。「發展」指經濟方面的改變，特重投資者的社會背景，以及私人投資者與官僚的關係。

研究近代中國城市有三種理論：其一、認為現代西方式的工業城市為中國現代

化的先驅，城市先現代化，由城市影響鄉村，使全國現代化。其二、認為城市為帝國主義者侵略中國的基地，不僅對中國的現代化沒有好處，且破壞中國農村經濟，中共有這種看法。其三、認為城市和中國的現代化並無重要關連，城市的發展是孤立的。近代中國經濟受「自給自足」的傳統所影響，工業都是中小型的，有的在鄉村發展，有的在城市發展，都偏重於地區性的自給自足，所以城市與鄉村的發展有趨於平衡的趨勢，與西方近代城市發展的經驗不同。研究上海的墨爾腓認為：中國口岸城市的發展與內陸是兩個方向，口岸城市取近代西方城市發展的路，而內陸仍維持傳統的經濟體系，生活很少受口岸城市的影響。就這三個理論來衡量濟南，因為濟南不是口岸城市，它無力帶動中國的現代化（本身現代化失敗），也非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基地（經濟、政治操於中國人之手），又不能說與現代中國的命運沒有關連。濟南的現代化，建基於城市本身的發展，一八九〇至一九四九年間濟南的商業和工業皆有增加，若非政治局勢和戰爭影響，現代化的發展是有希望的。

城市發展的原因很多，如北京為大帝國的行政中心，紐約是一個整合的商業經濟的貿易中心，均能發展成大城市。上海因為是內陸航運的集中地，又是長江三角洲的世界航線的集中地，也能發展為大城市^①。濟南不同於有租界的城市，行政權半落於外人之手；也不同於其他有城牆的內陸城市，與鄉村隔離；濟南雖有城牆，但有鐵路、運河對外聯絡，也有中國人自關的商埠供中外人士經商。其城市發展，為特殊的類型。

著者在第一章中，對研究的發現有初步的揭露，在他看來，一八九〇年前夕的中國經濟並非「未開發的」（underdeveloped）形式，而是相當發展的前工業經濟（preindustrial economy），此種經濟，生產操於農人與工人之手，沒有大規模的生產單位。在這種經濟體系下，史堅雅（G. William Skinner）認為生產者與消費者的關係，是透過市集而建立。伊懋可（Mark Elvin）認為這種經濟的特色是「高水準的平衡」（high-level equilibrium），由於人口增加，生產不足，中國才走西方式的發展道路，從事城市大工業的建立。

濟南在走西方方式的發展道路時，是循十九世紀中國發展工商業的一般類型，即官督商辦。經袁世凱時代，到一九三〇年代，省市政府又把不能獲利的服務業，漸由私人手中收回。另一方面，濟南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先後出現了買辦資本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這兩種資本主義，一般被認為是阻害中國經濟發展的。

^① Rhoads Murphey, *Shanghai: Key to Modern China*, p. 2.

著者於第一章概述中國城市發展的特性和一般趨勢後，第二章以下，即分期論述濟南在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生活上的變遷。

第二章「十九世紀晚期的濟南」，除描述濟南的泉水、市場、商行、衙門等方面的狀況外，主要介紹十九世紀山東的商業系統、一八五〇年以後山東經濟制度的改變、濟南的政治和經濟勢力、濟南的社會生活和社會階級，以及中日甲午戰爭和拳亂對濟南的影響。

濟南是行政城市，十九世紀時商業地位不如政治地位。城牆建於一三七〇年代濟南成爲山東省會時，十九世紀晚期的城牆有六公里半長，十米高，基寬二十米，城門處有塔樓。

十九世紀初期，山東有四大商業中心，即濟寧、臨清、濟南和濰縣。這種商業系統，受民亂的影響、受黃河改道的影響、受開口通商後沿海貿易日增的影響，更受東北開放給漢人移民的影響，是逐漸改變的。著者因而指出：從近代山東經濟地理的改變，可以看出中國的歷史是變的，不是靜止的^②。在山東商業系統改變的過程中，濟寧和臨清衰落，濟南和濰縣繼續繁榮。濟寧和臨清的衰落，導因於一八五五年黃河改道、運河淤淺和漕運停止，而一八五四年前後太平軍和清軍在臨清爭戰，以及一八六〇到一八六三年間宋景詩據臨清作亂，對臨清的經濟破壞尤大。

濟南的政治和經濟勢力操於兩類人之手：一類爲政府官員（多外省人）及其幕僚，一類爲地方紳商（商人、退休或候補官吏）。兩類人士相結，操縱政治及經濟勢力。太平軍之亂、捻亂以及黃河水患都增加他們的團結力。山東巡撫張曜、陳士杰等都與地方士紳結合，使地方士紳辦團練、修黃河堤防、捐款救濟。士紳確做了不少親民的事業，著者強調：若謂士紳只榨取農民，實屬錯誤^③。濟南的商業操在本地人之手，外省的商人勢力不大。濟南的外國勢力始於一八六五年天主教會建教堂，到一八八〇年代新教也來此設教堂和醫院，但外人的傳教，頗受當地士紳所組的「廣仁善局」排斥，可以說教士的勢力和士紳的勢力是衝突的。

在十八世紀末，濟南有五萬人，一八三七年增至十二萬八千人，二十世紀初增至二十五萬人。濟南是儒家文化的一個中心，有省考棚和縣考棚，並有四個書院。另有文廟、城隍，爲紳民崇祀之所。十九世紀晚期，濟南城有回民八千人，天主教徒數百人，基督教徒數十人。大鼓書是一般市民的娛樂所在。公共設施很落後，衙

② 原書頁二三。

③ 原書頁三〇～三一。

生不好，患病者多，也常有火災。一八八〇年代的濟南人口，約有下列人等：官員、退休或候補官員、富紳、醫生、教師、教士、商人、技工、僕人、士兵、工人、農人和乞丐。另大明湖畔有妓女戶，生意最好的季節為考季，據云有某臬臺深為考生的行爲而氣憤，他把所有能找到的妓女都抓起來，按豬肉價論斤賣給農戶為妻。

山東在一八五〇至一八六〇年代的反內亂中，崛起了一羣掌權的保守士紳，這羣士紳的勢力在拳亂中被破壞。袁世凱任東撫後，開始與外人接觸，並審慎採用外國方法，以保護中國的文化和權益。袁後雖轉任直隸總督並任職中央政府，但他一直對山東維持着影響力。

第三章，晚清改革時期的濟南（一九〇一～一九一一），主要論述袁世凱在山東的優越勢力、袁世凱對抗德國在山東的擴張、政府所支持的濟南改革、濟南的外人社會、以及改革派士紳的興起。此期間，影響濟南發展的有三種力量：一是袁世凱及其影響力，二是德國人的力量，三是地方士紳的力量。

一八九九至一九〇〇年袁世凱任山東巡撫，力謀退阻德國在山東擴張勢力。他一方面鼓勵士紳和民眾與外人競爭，一方面推展現代化建設。袁於拳亂平後，曾約見教士，暢談濟南的改革計劃，包括建立現代學校、創刊日報、成立官立銀行、建立工藝局和創設現代警察。袁不久雖轉任直隸總督，但後任巡撫多能執行袁的政策。袁以後的山東巡撫第一個與袁有關係的是周馥，周為袁在朝鮮時代的部屬，其任巡撫為袁所推薦，故執行袁的政策。第二個與袁有關係的巡撫是楊士驥，楊士驥係由直隸布政使升任（袁任直督），其兄楊士琦為袁的得力部屬，楊士驥的兒子娶了袁的女兒。楊士驥自然也繼續推行袁的政策。楊士驥以後的兩任巡撫雖與袁沒有直接關係，但袁樹勳曾任上海道，以上海的現代化規模建設濟南，改良警政，修鋪道路，收集垃圾，擴建城門；孫寶琦出身駐德公使，亦是現代化的推動者；二者均帶動了濟南的發展。

袁世凱的基本政策是與德人對抗，其後山東官紳也多本此立場。如德人組山東鐵路公司，投資五千四百萬馬克建膠濟鐵路，僅巡撫周馥曾稍作投資，山東紳商均不投資。又如德人組山東礦務公司，投資六百萬馬克（一九〇五年約合一三〇萬美元），開坊子、博山等地煤礦，山東官紳士民全無投資興趣。這一點與上海不同，上海的外人企業中，有百分之四十的中國資本^④。德人修膠濟鐵路雖然獲利，但用

^④ Murphey, p. 6.

新法採煤，並不能與土礦競爭，到一九一三年，山東礦務公司的股票，全部以半價賣給山東鐵路公司。

一九〇〇年時，濟南只有五十個外國人，多歐美傳教士。但自膠濟鐵路通車，外國的使領人員和商人增多。爲了集中管理外人，一九〇四年袁世凱與周馥聯合奏請將濟南、周村、濰縣開爲商埠。一九〇六年濟南正式開埠，楊士驥使英、日在濟南設立領事館，允日本三井公司在濟南設分號，以防德人勢力過度膨脹。濟南商埠的開闢，促成了市區的現代化。此期的濟南，有英人、美人和日人的公司，有電燈、電報、電話、郵政、銀行、報社，有三十四家旅館、一〇六家妓院、一家電影院和許多戲院。不少現代化的建設都由官方支持，如支持私人建立電燈公司、支持將書院改成學校等。

由於地方官配合清廷的改革措施，一九〇五年以後山東即出現改革派的士紳，有的屬於革命黨，如劉冠三於一九〇五年在濟南辦山左公學，爲革命基地，到一九〇七年關閉。改革的重點，大概說來，一九〇五至一九〇八年間是興辦新式教育，一九〇八至一九一一年間是辦理諮議局選舉及城鎮鄉地方自治。士紳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應該失勢，但著者發現：現代化卻增加了士紳的勢力^⑤，辦學和選舉都給士紳以合法的地位。

第四章「民初的濟南（一九一二～一九一六）」，主要探討一九一一年濟南的獨立運動、袁世凱與山東士紳的鬭爭、山東的外國勢力、一九一六年五月中華革命黨在山東的起兵、以及濟南的繼續現代化。

山東在歷史地理上分爲魯區和齊區，魯區以濟寧爲中心，因地近孔孟故鄉，人民較保守；齊區以濰縣爲中心，因地近沿海的煙臺港和青島港，人民較激進。一九一一年在濟南推動山東獨立的丁世嶧、周樹標、王訥等都來自齊區。山東獨立不久，受袁世凱運動，又取消獨立，齊區革命黨人以煙臺爲中心，續與清軍第五鎮對抗，至滿清退位始罷。清帝退位後，山東一直爲袁的手下所控制，但士紳階層對袁發生了離心力。一九一五至一九一六年的反帝制時期，齊區出現了強有力反袁勢力。

袁世凱早年培養山東的士紳力量，以推動現代化的建設，並用以對抗德人。此士紳的力量，到民國初年成爲山東反袁的主力。山東士紳在民初反袁，有幾個原因：其一、袁世凱解散國會和省議會，議員回鄉辦教育、經商或從事其他活動，對

^⑤ 原書頁六六。

袁的破壞共和極感不滿。其二、日侵青島，並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要求，山東士紳反對，而袁對二十一條無力交涉，使山東士紳對袁的領導不信任。其三、袁世凱加強促使地方稅解交中央，為節省經費停辦許多學校，並增加牙稅，使紳民離心。其四、袁安插私人在山東，增加地方反感。

山東的外國勢力，初有德國，繼有日本。在著者看來，日本向東三省發展，也許是為了國防和資源的原因，向山東發展乃是為了控制中國。故侵入山東後，即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要求。二十一條交涉時，日本增兵山東，山東地方當局盡量避免與日本衝突，當時魯區紳民反日特烈。袁稱帝時，齊區士紳聯日反袁。袁死，日本支持段祺瑞，齊區士紳轉而反日，魯區士紳則轉而擁段聯日。魯區由反日而聯日可能是受靳雲鵬和潘復的影響，二人皆濟寧人，靳督魯，潘助之，皆擁段。

齊區在反袁時聯日，袁死後反日，是受中華革命黨的影響。一九一六年四、五月間，居正所率的東北軍在濰縣、周村一帶作反袁活動，當時日本支持革命黨，居正勢力甚盛，但進攻濟南則無所成。段祺瑞時代，齊區轉而反日，亦是受革命黨的影響，當時革命黨反段，而段恃日本為靠山。

一九一一至一九一六年山東雖有動亂，但濟南仍繼續在現代化中成長。一九一三年省議會停閉後，有大東日報（日銷八百份）、山東日報（日銷一千二百份）等代表輿論。當時津浦鐵路通車（一九一二），濟南因位於津浦與膠濟鐵路的交點，成為山東的商業中心。一九一四年夏，濟南舉辦一次商展，展覽山東各地的農產品和工藝品。時濟南已有不少現代化的建築，商埠區有二十家新式的中國旅館、一家德國旅館、二家日本旅館、三家日本藥房、四家日本商店，另有日本領事館、日本橫濱銀行和日人經營的餐廳、理髮店等。加上十家書店、十三家印刷廠、四家戲院，以及山東省立圖書館、美人所辦的醫校（後改為齊魯大學）、政府所辦的三十二所中學，濟南已相當具有現代城市的色彩。一九一四年的濟南人口是二四五、九九〇人，交通工具也有進步。黃包車在一九一一年還是鐵包木輪的，一九一二年以後漸變為膠輪的，省府官員和外國人也有以汽車代步的。

第五章「軍閥時期濟南的政治權力（一九一六～一九二七）」，主要論述北洋軍在山東的優越勢力、日本對山東的政策、濟南士紳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抗拒、青島與膠濟鐵路的歸還中國、山東省級領導階層的衰落，以及張宗昌的統治山東。

此期山東一直受北京政府的控制，不管北京政府屬於何派北洋軍人。皖系當政時的山東督軍張樹元、靳雲鵬皆屬皖系，直系當政時的山東督軍田中玉屬直系、鄭

士琦屬皖系，奉系當政時的山東督軍張宗昌屬奉系。

日本在袁世凱陰謀稱帝時，原支持山東反袁軍，袁死後，日本透過西原借款，支持段祺瑞。支持段祺瑞的目的，是陰謀佔取更多權益。對日本來說，山東的地位有如東北，以青島為對外港口，猶大連之與東北；以濟南為運輸網的中心，猶瀋陽之與東北；以膠濟鐵路為運輸幹線，猶南滿路之與東北；開採淄川、博山煤礦，猶開採鞍山、撫順煤礦；日本並在青島、濰縣、張店、濟南等地發展其他工業。日本對山東的政策較德國為積極，德國未能使山東變成真正的勢力範圍，而日本卻能。主要原因，山東的農產品及煤礦為日本所需，而這些產品對德國並不重要。另一方面，在袁世凱主導山東的時代，用各種方法對抗德國進一步侵佔山東利權，而皖系當政時代，對日本採取妥協政策，不與日本對抗。在這種情形下，日本在山東的勢力迅速擴張。在濟南的日本人，一九一八至一九二四年間約二、三千人，在青島的日本人，一九一三年一千人，一九一六年不足三千人，一九一八年增加到一萬六千人。與日人數目增加相伴而生的，是日人工礦商業的增加。到五四運動發生，才遏阻了日本勢力在山東的進一步發展。

日本在山東勢力日增，由於地方官配合中央政府對日本採取妥協政策，這引起山東紳商士民對日本的對抗。當時濟南的經濟勢力分為兩派：一派為官僚資本，主要來自魯區，以靳雲鵬、潘復為代表；一派為私人資本，主要來自齊區。有意與日本對抗的，是私人資本。一九一七年，省議會對日人在膠濟路沿線設郵局提出抗議，謂侵犯中國主權。另一方面，濟南商界領袖也反對日人的投資和工商業活動。一九一七年十一月，濟南羣眾大會反對日人在坊子的行政措施，但段政府對此不聞不問。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五日，時巴黎和會正在召開，濟南羣眾在省議會集合，要求收回青島及山東權益，教育會、商會、農會皆致電巴黎和會代表，要求將青島歸還中國。在此後的兩個多月中，濟南發生好幾次羣眾大會和遊行，主要由商界策動，得到進步士紳的支持。魯區的官僚資本家和革命黨人都未參與。五四運動發生後，濟南的學界、工界起而響應，五月二十四日有抵制日貨大會，七月二十三日並焚毀親日親段的昌言報。段在日方的壓力下，於七月二十三日以後大力鎮壓山東的反日活動，甚至有三個回教徒以宣傳共產主義的罪名被處死刑。此後山東的反日活動暫時停止，但山東人民的反日情緒繼續存在，有的並轉向其他過激運動。一九二〇年五月，濟南省中的職員王湘岑組織馬克斯主義研究會。一九二一年七月，省立師範的學生王盡美（王湘岑的親戚）代表參加中共在上海舉行的一全大會。之後，

濟南的共產主義運動從組織工人著手，辦有濟南勞動週報，為大民主報的附刊。除共產主義者外，中國國民黨人王樂平於五四時期在濟南辦有齊魯日報，並經營書店，出售孫中山先生的著作。但由於受到軍閥和帝國主義者的鎮壓，到一九二〇年代初期，國民黨和中共的活動都在濟南消失。

五四運動時期，日本為緩和中國方面的反對，在巴黎和會中答應歸還膠州問題另擇日期商談。一九二〇年春，濟南紳商抗議日本延期談判青島歸還問題。當時親日派主張中日直接談判，一般輿論則主張訴於華盛頓裁軍會議。到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中日雙方同意在華盛頓會議中另開會議談判山東問題。華盛頓會議對山東問題的決定是：歸還膠州租借地，中國購回膠濟鐵路，處理坊子、淄川和金嶺鎮的煤鐵礦。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中日雙方在北京訂約，中國收回青島及膠濟鐵路，中國對日本在青島的投資給予二百萬元的補償，對膠濟鐵路給予四千萬日元的補償，皆十五年（到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付清，另加百分之六的利息。是月，魯大公司成立，接管坊子、淄川、金嶺鎮的煤鐵礦，此公司主要股權屬於日人，山東人投資者有靳雲鵬、潘復、張肇銓等。華盛頓會議後，日本雖撤出山東，但仍為山東最大的外國勢力。一九二七至一九二八年北伐期間日本兩度出兵山東，部分原因在此。

軍閥時期的山東省議會，對立法毫無作用，由於各派紛爭，一九二二年的省議會有一年多沒有選出議長。當時山東的重要政經勢力，不是控制在軍閥，就是控制在日人之手，地方紳商由於不能團結，尤其是齊魯相爭，與軍閥和帝國主義者的競爭是失敗的。一九二五年五月七日，張宗昌任山東督軍（時已改稱督辦），宣佈戒嚴，並增加七種雜稅，一時學校關閉，膠濟鐵路因運兵而時常中止正常班車。張宗昌也鎮壓五卅反日反英運動。著者認為：「張宗昌的統治，暗無天日」^⑥。

山東在袁世凱主導時期（一九〇〇～一九一六），政府及袁世凱都支持反帝國主義運動。其後的軍閥不僅自私，對外亦不能維護人民利益，故山東地方紳商士民都反對軍閥和帝國主義。

第六章「軍閥時期濟南的經濟和社會生活」，主要探討資本主義的成長（著者稱為「資本主義黃金時期（一九一六～一九二三）」）、濟南的勞工、政府的角色、以及濟南的社會生活。

著者視一九一六至一九二三年為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黃金時期，主要因為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列強及外國貨物對中國的壓力稍緩，中國工業得以發展之故。但著

⑥ 原書頁一二六。

者並不認為當時中國工業發展完全與帝國主義暫時在中國消褪有關，日本在山東的勢力甚盛，但山東的工業仍有很大的發展。山東工業發展的原因，部分是由於津浦路的通車，山東，特別是濟南，對其他各省的交通轉為便利之故。

一九二〇年代濟南的商業分為四幫：章邱幫經營銀行、糧煤、麵粉、繅絲；歷城幫經營糧食、報紙、服務業、銀行、麵粉、棉織；壽光幫經營食鹽、銀行、糧煤、麵粉；桓臺幫經營銀行、糧食、麵粉、棉織。四幫皆來自小清河沿岸，屬於齊區。齊區的商人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左右着濟南的經濟。一九二〇年代的濟南經濟，有些統計數字可資參證。據統計，一九二〇年代初期濟南有銀行二十二家（屬於日本者四家，屬於中央政府者五家，屬於地方政府者三家，屬於私營者十家；私營的十家，由山東人經營者六家，由外省人經營者四家），麵粉廠十家，印刷廠五十九家，鞋店三一七家（其中皮鞋店五十六家）。濟南的麵粉業發達，十家麵粉廠佔濟南工業總投資額的百分之三十，共六百餘萬元，投資者多為糧商。此期官僚資本工業也相當發達，魯豐紗廠一九一五年由潘復倡導，一九一七年由靳雲鵬等段派人物支持成立，用日本機器，一九一九年開始生產。另外，潘復、靳雲鵬也投資建立甜菜糖廠，馬良投資建立紙廠，這些都是官僚資本工業。外資工業以日本者為主，日本在山東的工業集中在青島，濟南只有兩家日本火柴廠，另有出口業。

一九〇〇至一九二三年間，山東的商人大都在濟南投資，因為濟南受中國政治勢力的控制，亦較少受外力競爭。一九二三年青島歸還中國後，濟南的許多商店，特別是來濟南開設支店的天津、上海的商店，都遷移到青島去，因為青島為口岸城市，許多商號的轉往青島，對濟南的經濟是一大打擊，到一九二五年張宗昌督魯，實行重稅和軍事統治，使濟南經濟進一步遭到打擊，以後就沒有恢復到一九二三年以前的情況。

在濟南工業發展的過程中，勞工問題漸成為社會上引人注意的問題。一九二四年的濟南人口三十萬，有十七萬為勞働者。這些勞働者大部在家做手工，在工廠工作者約一萬人，其中五千六百個是男工，三千五百個是女工，九百個是小孩。每月工資，小孩二元，男工二十元，養五口之家需要十五元，似乎工廠工人的生活並不差。受五四運動的影響，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二年間濟南的工人曾有幾次罷工，有的要求增加工資，有的反對增加工時。一般而論，中國工廠多能應工人的要求而解決問題，日本工廠則用鎮壓手段。當時工人也試圖組織工會，但因軍閥和帝國主義者都採鎮壓態度，無所成就。

濟南的發展得力於行政部門者至大。濟南約有三萬五千名公教人員，從事各方面的工作。一九二二年山東省預算總收入一、八九一、〇〇〇元，田賦佔百分之六七·〇，墾田收入佔一〇·六，貨物稅及牌照稅佔一五·五，其他佔六·九；總支出一、三二三、〇〇〇元，教育佔百分之五六·〇，行政佔一九·九，財政佔一七·四，工業佔六·七。此一預算執行雖未必確實，大體可以看出行政運作的情形。濟南的行政和建設經費，一半靠省費貼補，省政對濟南發展的影響至大。中央政府的地方機構，對濟南的現代化也很有幫助，如津浦鐵路局、濟南郵局、以及鹽務機構等，都有許多建築和人員。

濟南的都市秩序部分靠警察維持，部分靠商會維持，此期濟南有警察一千七百五十人（另有四十名救火員），分駐於全城十六個派出所，管理有關建築、工業、交通、報紙、戲院、市場、火災、衛生、疾病等事，並核發車船、妓院、戲院等執照。商會是一九二〇年代後期省議會取消後很重要的民意機構，但只代表商界的利益。

士紳的勢力在此期有衰落的迹象。社會救濟事業原由士紳出錢辦理，其角色漸由政府取代，惟政府仍用士紳管理一些救濟機構。學校教員在一九一四年以前多由士紳擔任，以後則漸由新學之士擔任。這是教育上的一種轉變。教育轉變的另一現象是課程的西化，並強調民族主義和自由主義。

軍閥時期的濟南社會，較前已有不少改變。居住於濟南的人約有下列十餘種：①官員或退休官員，官員與清末不同的是本省人增多。②軍人：較清末地位重要，不少行政部門由軍人把持。③在清末常見的候補官員已經沒有，代之而來的是省議員。④包括醫生、教員、教士、商人的中等階級較前增多，新學之士日多，士紳日少。⑤技術工人：多在舊式的店舖中，濟南有此類店舖三千五百個。⑥僕人、士兵、工人、乞丐仍然存在，士兵、工人較前增多。⑦下級公教人員的數目不少於清末，雖然教育背景已不相同。⑧學生：據著者統計，小學生一萬二千人，中學生二千五百人，大專生一千二百人，此為新興勢力，清代只有考試時期學生才集中在濟南。⑨外國人：較前增加。一九二〇年代早期有一千七百個日人，二百三十個歐人，一百五十個教士及其眷屬，另有外國技術人員在鐵路、電力、電話等機關服務。⑩土匪：在鄉間搶劫，來城市逍遙、購武器。⑪農人：多居於城郊。

在社會生活方面，中外人士有不同的社交圈。外國人組有濟南府俱樂部，並常舉辦講演會、音樂會；中國紳商也組有俱樂部，他們的休閒生活是作詩、賭博、看

戲。據說江青就是在此時濟南的戲院中演過戲。鴉片雖然禁止，但由於日人、韓人、白俄人走私，吸食仍甚普遍。妓女戶的普遍也是城市的特色，一九二三年濟南有五三〇家妓女戶、一千零八十個妓女。妓女戶為紳商的逍遙處。著者指賭博、吸鴉片、逛妓院是中國城市生活的一大特色；墨爾腓研究上海，亦對這些方面有所描述。但此類城市生活方式，實是世界性的^⑦。

第七章，國民政府統治十年的濟南（一九二七～一九三七），主要論述五三慘案、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間的濟南、韓復榘的施政及其治理下的濟南、一九三〇年代的濟南經濟、以及韓復榘的垮臺。

北伐以後影響國民政府對濟南作有效統治的有兩大因素，一為馮玉祥的勢力，一為日本的干涉。日本對山東的干涉始於北伐時期。一九二七年國民革命軍進抵濟南，日本以保護僑民為名，派軍至青島、濟南，旋國民革命軍因內部整合發生問題而撤退，日軍亦退。不久，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辭職，並赴日本訪問。蔣曾造訪日本內閣總理田中，田中告以日人在滿洲的利益不容侵害，蔣答以中國任何一片領土皆須統一。蔣歸國後，繼續領導北伐，一九二八年初，國民革命軍沿津浦路北上，北京政府以張宗昌負責濟南至青島的防務，孫傳芳負責濟寧至徐州的防務。四月二十一日濟寧失守，孫傳芳走天津，張宗昌循海路去東北。四月三十日，濟南為國民革命軍佔有。日本以保護僑民和日本投資為名，早在四月十九日即自天津派兵三百名至濟南。四月二十七日，日本援軍至青島，並沿膠濟鐵路進至濟南。五月二、三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率軍四萬人駐濟南。五月三日，日軍向中國軍隊開火，戰爭延至五月五日，中國方面有一千人傷亡，日本方面有二十五人傷亡。之後中日間達成協議，中國軍隊退出濟南。五日，蔣率部回泰安，仍留小許部隊住守濟南城內。五月七日，增援日軍二千人抵濟南，次日炮轟濟南城，十日，李延年率部撤出濟南城。次日，在商會斡旋下停火。第二次衝突，日軍有一五〇人傷亡，中國方面死亡三千人，傷者無計。這就是歷史上通稱的五三慘案。

五三慘案後的一年中，即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間，濟南由日軍佔領，山東省府設在泰安，馮玉祥部的孫良誠任省主席，膠東有張宗昌殘部。一九二九年五月，日軍自濟南撤軍。由於魯北發生飢荒，治安不寧，濟南商務大衰。

一九二九年以後的山東省政，初在孫良誠之手，大部時間則操於韓復榘之手。韓原為馮玉祥的部將，一九二九年四月馮反抗中央時，韓首被中央安撫，授為河南

^⑦ Murphey, pp. 7-8.

省主席，一九三〇年九月十日轉任山東省主席。韓就任主席後，濟南秩序恢復，他在任六年，此六年是袁世凱時代以後山東和濟南最穩定的年代。

韓復榘主魯時期，每年都將應繳給中央的稅款解交南京。由於青島和膠濟鐵路的收入由中央控制，山東的稅收百分之六三·九來自田賦。在社會建設上，韓任河南省主席時，已使梁漱溟從事鄉村建設，到山東後，繼續請梁在鄒平從事鄉村建設的實驗，這使韓得到改革者的令名。一般省政，韓注意建設道路，修整運河，擴建電報、電話等，但不重工商業，這在中國各都市都從事工商發展的一九三〇年代，韓的政策是保守的。韓對教育也很重視，但著者認為他的教育政策是雙軌的：教育廳長何思源為國民黨人，在城區執行國民黨的教育政策；在鄉區韓則採取梁漱溟的辦法，用中國傳統的一套。

韓復榘治下的濟南，有進步的一面，也有不進步的一面。一九三三年濟南有人口四二七、〇〇〇人（自一九一九年以後年增百分之三），有三百個歐洲人，二千個日本人。在商埠區居住的雖然大部為中國人，但有許多西式建築。中國人居住的地方通常陰暗、骯髒，沒有公共衛生設備。當時濟南的一般運輸仍然靠人力，一九三三年只有二十五輛公共汽車。報業較前進步，此時濟南有八家日報，總銷路約一萬份。

此期濟南的經濟較前衰退。一九二〇年代中期，濟南附近的農業已相當商業化，農民生產棉花、花生、牛隻，大部為了市場的需要，此有助於工業化。但由於張宗昌的統治及其以後的戰爭，使商業停滯，阻止了工業化的發展。到一九三二年，受世界經濟恐慌的影響，濟南有二十家紗廠全部停業。不是所有的工業都凋敝，有可以維持的工業，有新創的工業，也有發展的工業。一九二五至一九三〇年間原來的十家麵粉廠，有四家倒閉，但至一九三〇年以後，又有兩家復業，這六家沒有倒閉的麵粉廠商都來自齊區，他們與銀行的關係較密；來自魯區的麵粉廠商則因資金週轉不靈，無法支持。一九三〇年代，有二家紡織廠、三家火柴廠和三家磚瓦廠的建立，磚瓦廠的興起，實是應合建築業的需要。當時濟南的棉業和棉紡織業尚稱發達，但棉織業較青島相差遠甚，因日本及中國資本多集中青島，內地的棉花多集中濟南運往青島。由於濟南的工商業自一九二〇年代中期以後轉衰，使濟南經濟逐漸變成日本經濟的一環。濟南工商業轉衰的主要原因有四點：①濟南此期沒有著意發展工商業，②世界經濟危機的影響，③日本帝國主義的肆意擴張，④濟南的中國工商階層疲弱。

工商業與金融不可分，此期濟南的金融也不振。一九二〇年代中期張宗昌破壞濟南金融後，民間的資金多存入日本銀行。一九三一年日幣貶值，商民損失甚大。此後濟南的日本銀行勢衰，中國政府所辦的銀行業務興盛，中國、交通、中央、中國商業四銀行，都在濟南設分行。爲應需要，一九三一年韓復榘成立山東民生銀行。除銀行外，一九三〇年代初期濟南尚有五十二家錢莊，以齊區及山西人的勢力最大。一九三七年日據山東以後，日本銀行勢力再盛，不僅中國官辦銀行結束，五十二家錢莊到一九三八年有三十二家關閉。

在工商業不振中，濟南的市政建設相當進步，市政府不僅接辦了私人辦的電話公司、電燈公司，並建立自來水和下水道系統，對城牆、道路、運河也加以整修，這使國家資本主義有成長的趨勢。

韓復榘主魯時代，濟南的工商業不景氣，但公共建設較前增加。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爆發後，使一切現代化的發展陷於停頓。韓出身軍閥，當危機來臨，即思自保實力。七七事變後，韓一面表示誓守濟南，一面與日本接觸以避免戰爭。因韓俱有實力，日本不敢用韓，韓也無意守山東。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南京陷落，政府西遷，韓自動放棄濟南。一九三八年一月四日韓以背棄職守的罪名被捕，一月二十四日被處死刑。

國民政府統治時期的濟南，有一個顯著的變化是富人與地主勢力的減退。主要原因，一方面因爲沒有省議會，他們沒有合法的政治地位，而韓的寡頭統治，也剝奪了他們參與的機會。在經濟方面，金融爲來自上海、南京的銀行所奪，工商業爲日本人所奪，濟南的經濟遠落在青島以後。由於韓復榘對各種反日活動採鎮壓政策，使日本在山東的勢力大增，也使山東經濟逐漸成爲日本經濟的一環。

第八章「戰時的濟南（一九三八～一九四八）」，分三部分論述，即日人對濟南的施政（一九三八～一九四五）、國民政府統治時期的濟南（一九四五～一九四八）、和戰爭對濟南的影響。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日本佔領濟南及膠濟鐵路沿線，廣大農村仍在游擊隊之手。國民政府對山東的游擊勢力初未重視，到一九三八年後半，由於中共也在山東從事游擊戰爭，國民政府才注意支持山東的游擊隊，以對抗中共的擴張。戰時的濟南爲一孤城，工商業凋敝，毫無進步。

日本佔領濟南後，組織保安會，找與日本合作的地方領袖幫助日本治理。到一九三八年組臨時省政府，由舊安福系軍人馬良主持，實聽命於日人。由於鄉區多在

游擊隊之手，山東稅收大減，韓復榘時期的稅收年達三千萬元，一九三九至一九四〇年度只有九百萬元。

戰時的濟南經濟，併入華北區整體系統之中。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華北開發公司接管了濟南電燈公司；韓復榘成立的民生銀行為日人所支持的聯合銀行取代，魯豐紡織公司為日人的東洋棉紡公司取代。國民政府時期的官僚資本和私人資本都沒落，代之而起的是日人所經營的大小企業和商店。日人也接管了濟南的教育，安排日本課程，包括日語在內。只小學教育可以維持正常，中學則因知識份子的逃走，教員不足。

由於工商業衰退，濟南的物資不足，糧、棉都要實行配給。通貨膨脹也在濟南發生，躉售物價，一九四二年是一九三六年的五倍，而一九四四年是一九三六年的三十倍。由於難民多，濟南人口增至五七五、〇〇〇人。但因為四鄉多游擊隊，濟南不僅不再像往日一樣是山東的政經中心，而且處於戒嚴狀態，人民只在上午八時至下午六時可以進出濟南城。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當時山東有共軍八萬五千人，在陳毅統率下。是年十二月，國軍第八軍在青島登陸，加強了濟南的防務，共軍只能在鄉區活動。一九四六年一月，政府令王耀武率軍到濟南，並任王為山東省主席，濟南一時恢復正常，外人恢復了傳教、辦學、開醫院，地方並辦選舉，成立省議會。當時濟南的市政主要是加強警務，以防共黨滲透；控制報紙言論，以安定民心；救濟並安撫難民等。濟南也從事公共設施的整建，但由於未能控制鄉區，從未再恢復一九二〇至一九三〇年代的繁榮。

由於膠濟路交通被共軍破壞，津浦路的火車也經常不通，濟南的軍火補給全靠空運。另一方面，因工商停頓，物價飛漲，濟南物資缺乏，食物、燃料均靠配給。在一九四八年五月，濟南圍城緊急之際，王耀武曾單獨謀求美國的援助，與美國駐青島領事史壯（Robert C. Strong）有所磋商，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一度贊同，但因青島至濟南間的運輸走廊中斷，援助無法實行。濟南的五十餘萬居民和王耀武的八萬軍隊被圍困，王耀武在政府的空投援助下加強防務，但由於防衛城南的吳化文部投降，到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四日共軍進城，王耀武被俘，濟南結束了國民政府統治時期。

濟南自一九二五年以後經濟衰退，一九三七年以後失去政治中心的地位，此後因受戰爭的影響，政治、經濟皆未再恢復舊觀，濟南朝着西方式的現代化努力，可

謂失敗。著者引述馬若孟 (Ramon Myers) 的研究，謂一九三八年以前的山東，農村經濟生活未太惡化，土地分配不均沒有顯著的增加，也沒有因為高利貸使農民淪為奴隸，但一九三七年以後情況改變：①受對日戰爭的影響，自一八九〇年代以來所進行的農業商業化停止。②戰爭使原已變化的農村經濟惡化，終使華北農業經濟瀕於破產。著者認為，濟南的情形也是一樣。濟南的經濟靠與內地間的貿易，內地貨物運此出口，所產輕工業品也運往內地供消費，成為濟南發展的動因。一九三七年以後，農村購買力差，生產力差，加以治安不寧，導致濟南與內地間貿易的停滯，經濟因而衰落。但另一方面，濟南的文化繼續往西方的和商業的方向發展，與鄉村間的差距愈來愈大，加深了社會和政治的危機。

第九章「濟南的政治和發展（一八九〇～一九四九）」，為全書的結論，分兩部分：一為對一九四九年以後濟南發展的展視，一為對濟南現代化失敗的檢討。

一九四九年中共佔據大陸後，中國城市發展的方向改變。中共的城市政策是把城市由消費者城市變為生產者城市，即城市大部人口都要從事生產，不同於一九四九年以前，城市人口只消耗農民和工人的產品。濟南真正改變在一九五五年下半年以後，是年中共全面將原來的私營工商業改為公私合營。一九五八至一九六〇年，中共在城市實行人民公社，消除了城市地主，也為濟南帶來了另一改變。一九七〇年以後，中共要求城市工業生產符合農業需要，如製造機車、拖拉機、化學肥料等，以供農業所需，這一政策，與一九四九年以前顯著不同。一九四九年以前的口岸城市工業，包括濟南在內，大都是為了出口，或供應城市所需，很少支援農業發展的需要。

一九四九年以後的濟南，恢復了山東政治權力中心的地位，不僅為山東省政府所在地，也為山東軍區的中心。濟南的政治權力，由原來的軍人、士紳、官僚、商界領袖手中，轉入中共幹部、新官僚和共軍手中。

濟南繼續扮演山東地區文化中心的地位，雖然文化的內容已經日漸改變。一九五八年山東大學由青島遷濟南，加上當地的山東師範學院等校，使濟南成為教育文化中心。一九六〇年代中共的文化大革命，把帶有資產階級和傳統色彩的舊文化打倒，加強建立所謂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文化。

綜觀全書，著者研究的重點是濟南的經濟、政治發展和文化變遷，以及外國勢力、經濟變遷和政治權力（特別是軍人、士紳、工商人士相結合時）對現代化的阻力和助力。就經濟現代化的情況而論：鐵路和小清河航運的開闢，使濟南的工商業

由傳統的發展為近代的，主要的成就在運輸業、服務業和出口包裝業。一般說來，工業的發展不如商業，工廠工人人數在城市居民中所佔的比例很低。濟南的商業主要是對內陸，遠勝於出口。濟南的經濟，主要握於中國人之手，且與外人對抗，很少人投資於外人的企業。影響濟南經濟發展最大的是中國軍人。一九一六年以前，袁世凱主導山東的時代，支持地方人士發展工商業以與外人競爭，但以後的軍閥，由於過度抽稅和不斷戰爭，使經濟情況愈來愈惡化，一九二五年以後張宗昌的主政和北伐戰爭，影響尤大。接着由於世界性的經濟恐慌和中日戰爭及剿共戰爭，使濟南的經濟凋敝而不復。著者認為：受中國政治影響愈多的城市愈不易現代化，如濟南；受外人控制愈多的城市愈易現代化，如瀋陽、青島^⑧。

就政治的現代化而論：政治現代化的起碼標準是建立一個穩定、有效率和理性的官僚體系，以服務於民選的政府。濟南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已有一個受西式教育的官僚體系，雖然這一官僚體系不一定穩定、有效率和富理性。一九四九年以前濟南從無民選的政府，濟南一直由強有力的軍人控制着。軍事統治較成功的是袁世凱和韓復榘，他們皆有傳統傾向。軍人統治頗影響專業的現代官僚體系的建立，因為許多重要職位常安插軍人。濟南在政治上也有進步：一九〇〇年以後對代議制度的接受、報業的興起、五四及其以後的反日民族運動等，都促使一般人民的政治化。

就文化的現代化而論：最大的改變是教育，政府及私人所辦的學校，採用西方課程，並訓練學生的國家意識。其他外國文化也滲入濟南，如娛樂方式、衣著、街道、建築、醫院、報紙、電影院、公共汽車、收音機、電力等方面的改變，無不走西方城市發展的路。這些新的城市文化，鄉間大部沒有。

濟南的發展，可以代表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國城市的一般情況：經濟和政治的現代化沒有達到，文化和技術方面則從西方吸取很多。濟南現代化失敗的原因，是因為現代化主要由地方紳商推動，一九二〇年代中期以後，紳商的勢力轉弱，軍閥和帝國主義者進一步破壞，使濟南的現代化發展不能持續。城市的現代化不能成功，或雖成功而未能帶動鄉區的進步，造成城鄉隔閡，這也許就是中共興起的一種原因。

全書正文之後，附有「參考資料」三種，一為「一九〇〇至一九三六年的濟南工業」，包括四個表及其說明；一為「一七七〇至一九七五年的濟南人口」，包括十個表及其說明；一為「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山東諮議局（對清政府的八點獨立）的

^⑧ 原書頁二一二。

要求」，係自中文資料翻譯而出。附錄之後為各章註釋、書目選要、中國名詞英譯表和索引。

本書引用資料二百五十餘種，包括中、英、美國檔案；山東通志、濟南府志、歷城縣志、中國實業志——山東省、支那省別全誌——山東省、鄭亦橋著「濟南」、倪錫英著「濟南」、葉春輝編「濟南指南」、黃澤蒼著「山東」、R. C. Forsyth 編“Shantung, Sacred Province of China”等方志性的資料；*China Annua* (1944)、*China Handbook* (1937-1945)、*China Yearbook* (1912-1939)、*Who's Who in China* (1925) 等年鑑和人名錄之類的資料；濟南市政公報 (1942)、濟南市政月刊 (1929-1933)、山東省政府公報 (1946-1948)、山東教育月刊 (1922-1924)、山東建設半月刊 (1936-1937)、東方雜誌、*Far Eastern Review* 等公報和期刊之類的資料；山東近代史資料、山東省志資料、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等資料匯編之類的資料；W. L. Garnett 著 *Journey Through the Provinces of Shantung and Kiangsu* (1907)、J. H. Lockhart 著 *Confidential Report of a Journey in Shantung* (1903) 等遊記和自傳之類的資料；北支五省礦業概要(1937)，中國省銀行史略 (1967)，Jerome Ch'en 著 *Yuan Shih-K'ai*，Charles Corbett 著 *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Ramon Myers 著 *The Chinese Peasant Economy*，John E. Schrecker 著 *Imperialism and Chinese Nationalism: Germany in Shantung*，John Thaurén 著 *The Missions in Shantung China*，Ge-zay Wood 著 *The Shantung Question* 等專論性的著作；以及姜貴、鐵雲、老舍的文學作品。所缺的是日報的資料，早期的日報，常被學界引用的有上海的「時報」、北京的「順天時報」等，一九三〇年代及其以後的報紙，藏在中國國民黨黨史會者至多，本書未加引用。

該書的缺點，除未注意日報資料外，是中日名詞的羅馬拼音表太簡略，許多重要的名詞都無法在表中查到原文。另外書目及名詞拼音表中，有些中文書寫錯誤，如「膠澳志」誤為「膠奧志」、「山東問題始末」誤為「山東問題史末」、「莊陔蘭」誤為「莊該蘭」、「徐鏡心」誤為「徐鐘心」、「辛家莊」誤為「幸家莊」、「鄒突泉」誤為「跑突泉」、「丁世嶧」誤為「丁世畢」、「銅瓦廂」誤為「銅瓦鄉」、「楊士琦」誤為「楊士騎」等。

就全書所處理的問題而論，為典型的歷史研究，對近年研究都市的學者所重視的都市環境、都市計劃、財政問題、教育問題、居住問題、貧窮問題、都市生活等

方面^⑨，該書僅對都市生活和教育問題有較多的論述。由於該書研究的重點是政治和經濟，對居住、貧窮等社會問題自然無暇多顧。又由於濟南的政治和經濟不是孤立的，濟南為山東的商業中心和政治樞紐，該書的重點雖在研究濟南，有相當多的篇幅論及山東全省的情況。這也許是必要的，但在閱讀時，總有一點混省政與市政為一的感覺。

該書所提出的許多論點，頗為新穎，但有些論點也容易引起爭議：其一、謂魯區保守，齊區激進，可能是就部分資料所作的推論。魯區的靳雲鵬、潘復等的接近段祺瑞政府態度，不一定代表全區人都保守，譬如二十一條交涉時，魯區紳民即極端反日；而齊區的反政府活動較多，可能與革命黨人的運動有關，不一定代表全區的人都激進。其二、謂張宗昌的統治暗無天日，可能是受了某些宣傳或演義材料的影響。張宗昌主魯，是軍閥鬪爭的高潮時期，實行軍事統治，乃是事實。據當時在山東任事者（如曾任職膠濟鐵路的孫繼丁）回憶，當時並無「暗無天日」的感覺。其三、謂韓復榘主魯時期，三民主義的教育政策未能貫徹到鄉區，也許過度強調了梁漱溟在鄉區的影響力。實際上，當時的三民主義教育措施，相當地可以貫徹到基層。其四、謂受中國人治理愈多的城市愈不易現代化，受外國人控制愈多的城市愈易現代化，也許只是從少數例證來看，如果進一步檢視廣州、南京、武漢、北京等的發展，此一推論就靠不住。最後，著者在開始時提出，要把濟南的發展與西方城市的發展作比較，西方城市有自治權，而中國城市沒有，這一點似乎是應該提出的。又該書分六期論述濟南的發展，非常明細，但不能給讀者一概括的印象，如能在結論中，以一九二三年為界線，將濟南的發展分為兩個時期來比較，或許更能予讀者以深刻的印象。

本文不厭其詳的介紹該書的論點與研究方向，深覺它對濟南和山東的研究，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架構。能為一個地區的研究建立令人滿意的架構，並以相當完備的資料充實它、以涵蓋性相當廣的理論解釋它，就是一個成功的研究。該書為城市化的研究創造一個案例，這個案例，與墨爾腓研究上海時所創造的案例，都為研究中國城市找出一些門徑。

^⑨ 參看 Louis K. Loewenstein, ed., *Urban Studies: An Introductory Reader*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1) 一書。

